

Nazi Germany: A New History

[德] 克劳斯·费舍尔 著
Klaus P. Fischer

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 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

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

Nazi Germany
A New History

[德] 克劳斯·费舍尔 著

萧韶工作室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上、下册)/(德)费舍尔著;萧韶译.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

书名原文: Nazi Germany

ISBN 7-214-03871-4

I. 纳... II. ①费... ②萧... III. 德意志第三帝国-历史
IV. 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2233 号

Nazi Germany

Copyright © 1998 by Klaus Fischer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4 by JSPPH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2-101

书 名 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上、下册)
著 者 [德]克劳斯·费舍尔
译 者 萧韶工作室
责任编辑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25
字 数 58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871-4/K·497
定 价 54.00 元(上、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数字图书馆
PDG

第九章 集权主义的种族国家

人们用许多描述性的标签来归纳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是流行的,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普遍采用“集权主义”这个词,后来则使用“多头治理的(polycratic)国家”或“种族国家”等名称。一些历史学家将纳粹帝国描绘为一个旧式的暴政,一个东方的宫廷,甚至不是一个国家。我们现在选择“集权主义的种族国家”这个词,因为希特勒的政治规划存在于种族主义的制度化以及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对集权主义方式的运用当中。我们还坚信:所有集权主义体制的本质存在于铸造一种新的、同质类型的人类存在,并且将这一人类存在用种族



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或者意识形态的术语加以概念化。因此，集权主义带来了人的标准化，这种标准化在纳粹德国是根据种族的概念构想的。约瑟夫·戈培尔说过：“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必然是一个集权主义的国家，它将渗透到公共生活的所有方面。”希特勒告诉赫尔曼·劳希宁：这个集权主义国家的目标是制造一种新的、上帝般的人类存在。按照希特勒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运动，甚至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它是一种创造新人的意志。

这一新的集权主义国家存活在 1933—1945 年之间，它的动力存在于通过相应的党和国家机构进行控制的手段的构成当中，存在于种族计划的制度化，以及为了战争和征服对整个德国民众的发动当中。

纳粹德国大致被视为一个等边三角形，希特勒处于三角形的顶端，国家和党构成了三角形的等边。当然，几何上的相似物只是起到比喻的目的，因为纳粹三角形的三个角是很少相等的，国家和党的界限也不是能加以清晰勾画的。党和国家的官员有时是相互重叠的和双重的，从而制造了一种在一些人眼里由混乱的、互相竞争的机构组成的体系。这一点只有部分的真实性。这个体系是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巨兽，但是它的组成部分——尽管会显示出周期的失调——运作还是相对流畅和有效的。确实，纳粹帝国无疑是人治的而非法治的国家，但是那些在纳粹党和国家机构工作的人恪守职责，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久经考验的日耳曼传统——尊重秩序、效率，服从权威。事实上，纳粹德国最为突出的行为就是忠诚，作为整体的德国领导人和德国人民都将自己献给了希特勒。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任何对纳粹帝国的分析都必须从希特勒开始着手，然后接着讨论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国家的机构，以及跨骑在两者之上的最为有力的组织——党卫队。

元首和元首原则

希特勒是纳粹德国,同时纳粹德国是希特勒。这意味着希特勒的个性、领导风格以及意识形态的信仰塑造了政府的性质和第三帝国的生活。希特勒相信人治而不是法治,实际上,这意味着决策是在个人许可或者希望中,而不是通过行政程序或者正式的法律产生的。确实,纳粹体制受到它所拒绝的东西的限制,这些东西包括《魏玛宪法》的民主基础,以及使《魏玛宪法》具有活力的法律传统。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新体制的精神体现在希特勒的言论中,在这些年里以不同的形式加以重复,这就是在德国只能有一个人的意志,这就是他自己的意志,其余的人必须对它完全服从。

但是,除了在种族和领土扩张的问题上元首有着毫不动摇的信念,他的意志并非一直是清晰的,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一种“奇想”。他天生的懒惰和决策的习惯间歇性地在第三帝国的等级阶层中引发了相当大的混乱,从而促使更有力的、更无情的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动机行事。这种结果就是经常发生的“集权主义的混乱”,它使许多历史学家误以为希特勒是一个“虚弱无力的独裁者”,较少参与自己政府的工作,没有能力处理日常的官僚政治事务,只好鼓励竞争和冲突,因此引发了“无休无止的冲突”、巨大的精力浪费,以及也许使胜利成果耗费一尽的混乱无章。

在使自己卷入日常政府工作的意义上来看,希特勒确实很少参与自己政府的工作,无疑这一观点有一定的真实性。正如下面所显示的,这是他艺术家气质和对科层制普遍厌恶的结果。只有他的角色受到了质疑,或者只有当他的主要决策受到了挑战的时候,他对政府事务较少的参与才是其虚弱无力的表征。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正如诺曼·里奇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是第三帝国的

主人。”阿道夫·希特勒是大众意志的化身，一直能感受到德国人民的最深需求。这一点在统治的中坚分子当中是不证自明的公理。鉴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这种假定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被纳粹吹嘘为“德国的民主”——依赖于人民主权至上是没有必要的。当然也会出现偶然的公民投票，但是都是事后举行的，用来判定人民对给定的议题有何感受而已。

希特勒是按照教会的思路来构想自己的政府的，他对罗马天主教会表示敬意，视自己为永远正确的教皇。正如一个年轻的希特勒的崇拜者所说的：“假如天主教会认识到在所有的信念和道德方面教皇是永远正确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同样发自内心的信念宣布，对于我们来说，元首在所有政治问题以及其他影响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问题上都显然是没有错误的。”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公共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如此完全的一致，个人的意志和胡思乱想构成了德国最高的法律。

同样无可争辩的是：希特勒的意志从来没有受到过严峻的挑战。他可能经常在没有书面指示的情况下进行运作，喜欢用口头的形式传达自己的命令，但是，事实是，这些命令具有法律的力量。在罗姆被清洗之后，希特勒宣布自己是德国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他并不介入法律的程序，而是依靠他的同伙去做这样的事。不过在任何他选择这样做的时候，他都保留了干预的权力。在马丁·涅姆勒牧师被法庭宣布在煽动谋反的起诉上无罪的时候，希特勒说道：“这是最后一次在我宣布一个人有罪之后，法庭却宣布他无罪。”希特勒实现了他的诺言，他亲自改变了正式组成的法律机构作出的判决。

总之，希特勒的权力是不容侵犯的。德国的士兵、公务员、所有在纳粹组织中工作的人员，以及绝大多数德国人民都宣誓忠于阿道夫·希特勒。正如汉斯·布克海姆所说的那样：领导的权力高于国家的权力，这是国家行政公认的原则，其结果就是对国家行政权力

的实际剥夺以有利于个人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是明确的法律规范和公共道德的约束。这样,纳粹党实际上相信他们已经征服了在西方世界曾经存在的国家的非个人性。

由此观之,对希特勒的个性和领导风格加以明晰的了解是关键所在,因为他的幻象和成见成为了公共政策。对于希特勒来说是真实的情况同样适合于那些支持他的人,因为这些人以自己的方式体现了元首人格的特殊一面。

希特勒的领导风格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这就是领袖必须获得强大的权力去从事他们必须去做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领导原则。一个人统治一个整体,但是一个人授予下属他们所需要的领导权力,以便实现他们的最高统治者为他们建立的目标。这是一种逐级下派的命令链,有人称之为新的封建关系。这种类比是有道理的,因为纳粹的领导选择和领导风格有时是建立在“一群小元首通过强迫实行的效忠进行一系列可笑的再次分封”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不能得出这样错误的结论:作为整体的纳粹体制因此是一种封建的非中心化,而不是集权主义的中心化。尽管纳粹帝国被一些由强有力的个人所管理的相互竞争的部门所分割,但是,这个国家是一个具有现代技术的、科层制的国家,它的目标是通过政府机构对国民生活的全面控制。希特勒实施着广泛而深入的领导,不受行政管理的政策或先例的控制。希特勒给予他的官员同样广泛的权力来完成他们的任务,同时鼓励最高层的下属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他相信:最优秀的男人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将占据上风。假如一个合适的人处于合适的位子,这一原则就会产生奇妙的效果;假如一个不合适的人处于不合适的位子,结果就会是混乱、混沌和灾难。作为达尔文原则的结果,激烈的争斗从纳粹政体的出现到结束就一直没有平息过。有几件事情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戈林发动了对普鲁士内政部的全面接管,组织政治警察,然后继续扩展各种权力。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与也在扩展自己地盘的竞争者发

生了冲突。在他负责“四年计划”的全权制订中，戈林与国家银行行长、经济部长、军事经济的全权代表希尔马·沙赫特发生了冲突。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希特勒鼓励这样的冲突，因为他要利用戈林打破在沙赫特和大企业、军方之间业已形成的联盟。

激烈的争斗在其他领域也十分盛行。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33年夺得了慕尼黑警察首领的职位，接着他以这个位子为基础蚕食德国其余的警察力量。他与戈林和戈培尔联手，设法铲除了主要的竞争对手恩斯特·罗姆，将党卫队建成了独立的力量，为集权主义的控制提供制度上的基础。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成为外交部长之前就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里宾特洛甫办公室与外交部竞争；更坏的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建立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办公室，开设了一个外交学校为外交服务提供受过意识形态训练的后备干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汉斯·路德博士企图将里宾特洛甫从外交部长的位子赶下来，其借口是这位外交部长在精神上不健全。路德在争斗中失败，被送进了集中营。约瑟夫·戈培尔根据临时需要进行结盟，大家公认他是德国宣传不可争议的催眠大师。但是，矮小的戈培尔实际上不断地和工作在相同领域的纳粹同僚争斗，这些人包括马克斯·阿曼、奥托·狄特里希、罗森堡和里宾特洛甫。尽管戈培尔聪明地建立了一个国家宣传的办公系统，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些机构落入区党部领导人的掌控之中，而他们只对希特勒负责。

无疑，希特勒喜欢这样持续不断的冲突，因为这样使每个人都依赖于他。正如卡尔·狄特里希·布拉舍尔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以“无可匹敌的内行手法”使用了这种使每个人都依赖于他的方法。纳粹统治混乱的画面——一些人描绘了这种画面——是一种误导和错误。希特勒在内心深处是一个设计者和建筑师。他确实喜欢一反常态地行事，一点也不注意时间或者日常事务，但是，他能以惊人的纪律和坚韧工作。希特勒喜欢在孤独中进行设计，远离柏林混



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乱的氛围。因为这个原因，他经常前往奥伯萨尔茨堡北坡靠近伯特斯加登的伯格霍夫。从他山中的屋子可以俯瞰整个峡谷，在那里，他扮演着庄严的建筑师和幻想家的角色，发布大胆的计划，并希望他的部下无条件地执行。

希特勒一生都讨厌系统的工作，喜欢以艺术家而不是行政管理者的方式，直觉和自发地做出决策。这一点部分地解释了他厌恶科层官僚的原因。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弗立克这样的人，他们能够不理睬官样文章，执行希特勒要他们做的事情。随之而来的是：不能在希特勒身上指望什么行政的领导才能，因为他并不尊重行政的程序。艾伯特·斯佩尔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建筑师，他经常想知道希特勒实际上是否在真正地工作。希特勒很晚才起床，安排一两个会议，但是从中午到傍晚他或多或少就懒散起来。另外一个观察者也注意到：希特勒完全不熟悉政府每日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对此加以解释，那就是他一生从来就没有在政府岗位上呆过一天。

除了是一位幻想的或者艺术家式的设计者之外，希特勒还是一位十分业余的人。事实上，斯佩尔坚持认为：“业余的性质是希特

勒主要个性之一。他从来就没有掌握一个专业，在他所有努力的领域，他始终都是一个局外人。像许多自学的人一样，他对真正的专门知识的意思一无所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无知无识的人。相反，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令专家惊讶、甚至有时令他们恐惧的快速反应能力。但是斯佩尔注意到：当他遇到真正的专家时，他会感到不舒服和不安全。另外，他的技术知识——尤其是与军事事务相关的——完全是有限的，取决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正如后来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他对新技术的发展没有任何感觉，尤其是对雷达、原子研究、喷气式战斗机和火箭。

当然，希特勒的风格是他性格的反映。为了理解他错综复杂的人格——他的许多方面永远都不会为理性的心灵所理解——不要将他妖魔化，不要将他描绘为暴躁的、无法控制的疯子，这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艾伯特·斯佩尔所说的：“假如在把希特勒描绘成独裁者时忽略了人类的特性，假如忽略了他的说服能力、他迷人的性格、甚至他炫耀出来的奥地利人的魅力，那么留下的只是推想和对他不真实的描绘。”

尽管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希特勒依然具有高度智力水平。他贪得无厌地阅读，能够以令人信服的专业意见谈论数百个话题。在社交界，希特勒极为迷人，并讨人喜欢，尤其对于女人来说更是如此。事实上，他喜欢女人把他围在中间，尽管他和她们的关系停留在表面上。他对女人的欣赏是抽象的。他将她们理想化为一些类型，但他并不爱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女人。

与公众的看法相反，希特勒非常具有幽默感，尽管——正如斯佩尔所指出的那样——它经常被用来嘲笑别人。他会说：“你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吗？戈林什么时候才能钻进戈培尔的裤子？”他还是一个超级模仿高手，能够模仿不同的人物，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希特勒喜欢听笑话，自己则不太愿意说。特别是当听见一个好的笑话时，他会“放声大笑，有时会前仰后伏，经常在痉挛中流出眼

泪”。但是，当粗俗的下属讲下流笑话的时候，他会显得不太舒服。

希特勒的另一个优点是对忠心于他的人也十分忠诚。他在秘书生日的时候送鲜花给他们；对司机和仆人非常有礼貌，经常坚持认为他们的需要先于他个人的需要；对忠诚的行为或突出的表现予以慷慨的奖赏；甚至念念不忘他的家人和仆人。他的老战友们只要不背叛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对他们的错误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予以合理化，称它们为“合理的腐败”。

希特勒喜欢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显示出从未有过的轻松。许多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大多数孩子无疑是经过表演设计的——捕捉到这个人身上真诚的瞬间。他在许多方面是幼稚的，因此较容易和孩子而不是成年人相处。希特勒也喜欢动物，特别是狗和狼。在维也纳最艰苦的岁月，他一直省下一点面包，用来喂养小鸟或松鼠。因为这个原因，他仇视猎人，认为他们是自然最美丽的生物的谋杀者。

希特勒对艺术也十分热爱，其中包括戏剧、绘画、雕塑、歌剧，尤其是建筑。他在处理重要的、急需的政治事务中抽出许多时间去欣赏歌剧，参观美术馆，浏览艺术书籍，培育艺术家群体。在大战期间，他不断地使艺术家逃避兵役，一想到在战斗中他们会被杀死，他就会感到惊恐。希特勒喜欢让自己沉浸在里夏德·瓦格纳、爱德华·格里格和安东·布鲁克纳的音乐中。他的朋友库比泽克在希特勒掌权许多年前就发现：“希特勒在听音乐的时候，他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暴躁的人，他变得安静、柔顺和驯良。”

尽管希特勒喜欢生活在奢华当中，但是他个人的趣味倒是简朴的。他既不抽烟，也不饮酒。在他的外甥女盖丽去世后，他还放弃了肉食，成了一个素食者。希特勒避免个人的卖弄。他只有几套公务服装，甚至他的军服也是简朴的。不像戈林着迷于私人财富和华而不实的制服，希特勒对个人的占有不感兴趣。相反，一年又一年，他只有相同的套装、风衣、鞋子和帽子。他的领带一直能戴到破旧

不堪为止。

阿兰·布洛克认为：“假如希特勒心情好的时候，他确实是一个吸引人的同伴。”数百位人证明了这一事实：希特勒的个性力量不仅能够吸引，而且能改变那些受到他影响的人。见多识广的将军们最初决定将希特勒从“真正的”军事领域排除出去，但是在他的面前，他们改变了想法，并向元首的最高智慧表示佩服。希特勒的戏剧表演人格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经常是具有说服力的。希特勒著名的情绪迸发经常让将军们颤抖，直冒冷汗，甚至这一点通常也是在做戏。事实上，除了极少数例外，希特勒的暴怒不是自发的，而是受到自我诱导的，经过算计产生期望的效果。希特勒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戏剧表演的天才，尤其是他催眠的眼睛。他的眼睛迷惑了受到它们影响的人。他的两只眼睛通常闪着蓝光，里面还带着少许绿灰色。他将自己的眼睛比作古希腊美杜莎的眼睛，它们刺透人心的一眼可以让一个人目瞪口呆。希特勒用眼睛说话，他企图用自己的戏剧表演天才来管理整个帝国。

从表面上看，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奇观出现了。但是，在元首国家和元首崇拜闪光的外表下面，我们通过更为严密的研究发现一个带有严重心理紊乱和明显犯罪倾向的人。历史学家在希特勒的人格方面存在着分歧。甚至在他死亡 50 年之后，公开的和私下的对希特勒的看法依然是含糊的、不明确的。尽管希特勒受到普遍的谴责，但是他依然使好奇者感到神魂颠倒，甚至觉得迷惑不解，同时，他的人格依然对专家提出了挑战。元首的人格似乎像变色龙一样难以把握，让人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甚至当使他的政策得以产生的邪恶意图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专家对德国这位专制者到底是什么类型的魔鬼达成一致的意見。除了死不改悔的纳粹党人，对于所有人来说，希特勒是世界历史上邪恶的力量，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任性的、残酷的领导人。但是他的形象依然是模糊的，这证明了我们还无法去解释邪恶的或者致命的毁灭性。

许多年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记者提供了许多对希特勒的解释。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人,针对当下的需求调整自己的政策,但是,他也对绝对权力充满了渴望,从来没有停止对它的追逐。一些采取心理学方法的历史学家将他描写为一个临界人物,显示出了自恋的、妄想狂的、神经质的心理特性,这些都使他难以捉摸和无法预测。心理学家走得更远,认为他是一个恶毒的施虐受虐狂,也许带有分裂的人格。医学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是一个瘾君子,忍受着安非他明的毒性,或者是诸如帕金森综合征这样的器质性脑疾病患者。这些理论中的一些是正确的,但是并不完全正确。尽管对人格变态的说法没有一致的意见,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专家不认为希特勒患有一种或几种人格上的变态。运用诊断上的或者历史上的(经验上的)证据,重新建立多种病症的轮廓是可能的,其中一些病症直接对纳粹德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这些病症分为以下七个方面:

1. 严重的焦虑状态
2. 压抑的自杀思维
3. 邪恶的攻击行为
4. 精神混乱
5. 迫害性的思想
6. 身体症状
7. 反社会的(犯罪的)倾向

严重的焦虑状态:历史学家几乎达成了普遍一致的看法:希特勒是一个对所有事情都高度紧张和习惯性地焦虑的人。他是一个严厉而又孩子气的人,经常深深地感到自己毫无价值,受到神经质的恐惧和妄想的折磨。他的一些强迫性行为从本质上说是对生活的否定。他被一些病态的想法所纠缠,包括腐烂、断头、勒死、血液的不纯洁和性病。这可能能够说明他的洁癖和苦行的生活。希特勒非常关注健康的食品。他成为素食主义者和戒酒者的原因之一

是治疗几乎使他感到无望的胃病。希特勒也担心他身体的气味，他不断地服药以防肠胃胀气，但是这些药丸含有土的宁和阿托品的成分，完全可能产生毒副作用。他有太多的恐惧和焦虑，因此感到有必要将它们结合为一个他能够轻易地确认并与之一战的大恐惧，这就是犹太人有害的影响。约阿希姆·费斯特认为：“恐惧是希特勒心理形成时期主要的经验，极度兴奋的状态和深深压抑的心情相互交替，在后一种心态中，他只看到不公正、仇恨和敌意。”库比泽克在1905年所知道的希特勒和1945年向整个世界挑战而深困在地下掩体中生病的希特勒并无二致，这是他强硬性的一个尺度。

压抑的自杀思维：尽管希特勒培育了一个拥有不可动摇的意志的外表，但是他对其生存的核心没有安全感，为没有意义的生存惩罚自己。像许多反社会的人一样，他害怕自己变得无足轻重。假如他不能成为伟人，他就会选择“零生活状态”，甚至灭绝。这一态度在变态的人当中是普遍的，他们将现实两分成尖锐的对立面。自杀的主题贯穿了希特勒的一生。无论什么时候失败了，他总是陷入深深的绝望当中，随后是痉挛和大怒。正如下面还要提到的，当1923年政变失败的时候，他告诉惊恐万状的听众：“假如政变成功了，一切万事大吉；假如政变失败了，我们就吊死自己。”后来，在连续夺取总理职位失败之后，他再次扬言要自杀。就在他向德国人民宣布向波兰宣战的那一天，他几乎用同样的口气说：假如战争失败，他就不会活到结束——从他的有着钢铁般意志的元首那里，德国人民几乎听不到什么令人安慰的信息。

邪恶的攻击行为：希特勒的行动证明他具有邪恶的毁灭性。甚至在谈话中，他就乐于吹捧他认为是重要的男性气质的美德，包括：力量、强硬、残酷、权力。他的思想沿着这种思路朝着极端化的倾向发展。坚强的东西是力量的标志，温柔的东西是软弱的表现；有力的东西是正确的，而无力的东西是虚弱和错误的。在他的演讲

中反复出现的短语是“不是……就是”，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只有两种选择——正确或错误、胜利或失败、力量或软弱。这种思想模式是强硬人物的典型特征，他们不能释放或者显示他们的感情，他们从人类的感情中退却出来，进入抽象观念的世界。希特勒欣赏进攻性的人物，因为他们没有显示感情的情况下冷酷地表现了自己的权威。直到戈林失去宠幸为止，他一直是希特勒喜欢作为典范来推荐的人，因为戈林能在危机当中冷酷地行动，同时在他处死敌手的时候依然神情冷漠。希特勒甚至推崇他的最伟大的对手之一约瑟夫·斯大林，把他作为世界历史中最非同一般的人物之一，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人。成吉思汗的游牧民族以无情的效率毁灭了城市，灭绝了敌国的男人、妇女和孩童，希特勒也认为自己和成吉思汗一样，并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将军。在元首的总部，一些机会难得的人忠实地记录了希特勒自然流露的自言自语，通过阅读这些材料，人们会发现阿兰·布洛克的看法：“希特勒的思想是粗俗的，狡猾而残酷，有力但全无人类的感情，无知又不知羞耻。”

从他最初在维也纳遭遇艰苦的生活开始，希特勒形成了残酷和冷漠的对待他人的思想，后来他将这种思想理性化为伪达尔文主义的术语。这种思想主张生活是无休无止的为生存的战斗，在其中只有最强者才能获得胜利。希特勒将力量和对对手的攻击、侵犯相等同。他羡慕残酷，认为它是显示自身优越性的方法。他曾经向劳希林坦承：“残酷令人激动。残酷和天然的残忍。人们需要神圣的恐怖。他们需要令人发抖的恐怖使他们在战栗中顺从。我不要集中营成为旧时代的监狱。恐怖是政治最有效的方法。”

精神混乱：希特勒是一个完全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缺乏在任何领域的扎实基础。正如我们所见，在年轻的时候，他毫无原则和区别，贪婪地阅读着书籍。他对世界的认识被可怜地扭曲，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特征。他不会说外国话，也从不到德国或奥地利以外的地方旅游。他爱幻想胜于现实，他的朋友库比泽克突出了他的

这一特性。在对希特勒侵犯形式的分析中，埃里希·弗罗姆认为：“假如将希特勒年轻时代的行为与他后来生活的资料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出现一种模式，是一种高度自恋的模式，它使一个人脱离世界，对他来说，幻想比现实更为真实。”但是，当希特勒非现实的观点受到挑战和质疑的时候，他会以愤怒和仇恨来作出反应；或者他会坚持认为他具有第六感觉，因此他会比别人知道得更好。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希特勒相信自己拥有稀有的预见能力，并且将一些决策建立在假定的洞察力上。人们会想起他的政治转化可能是以某种幻象为基础的，在其中有一种声音激励他为战败雪耻，拯救德国人民。在他一生的事业中，他相信这一发自内心的声音，同时命令他的随从也相信：“无论谁向我表明忠诚，他都以自己的宣言和态度成为这一事业的选民之一。”他感到明显的魔鬼之力围绕在他的周围，他将它们客观化为有血有肉的犹太犯罪分子。无须奇怪的是：他一直在思考不可思议的东西，在他的话语中，一种痛苦地拒绝服从现实的元素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迫害性的思想：迫害性的情结是希特勒有缺陷的人格结构的基石之一。希特勒对复杂事件性质的认识根本上是错误和混乱的，他总是将他的焦虑和恐惧外部化，责备巨大的外在力量超出了他的直接控制。他的演说天才就是企图说服德国人民相信：按照他的诊断，德国社会的疾病是世界犹太民族邪恶阴谋的结果。正如以前所揭示的，他的语言不断地带有宗教色彩：魔鬼的力量四处潜伏，随时可能进行“强奸”、灭绝或奴役德国人民的活动。因此，拯救存在于听从“血统的呼唤”之中，存在于听从一个人内在的民族意识当中。正在迫害德国人民的犹太人必须反过来受到迫害和灭绝。这里不存在任何选择，不是灭绝，就是被灭绝。

身体症状：希特勒的一生都受到身体症状和身体机能的困扰，他无休止地抱怨说不清的疼痛。他是一个受到焦虑折磨的忧郁症患者，不断地检查他的身体机能，测量脉搏，查阅医学书籍，热切地